

再造「公」與「義」的社會

與理性討論的空間

文 / 王汎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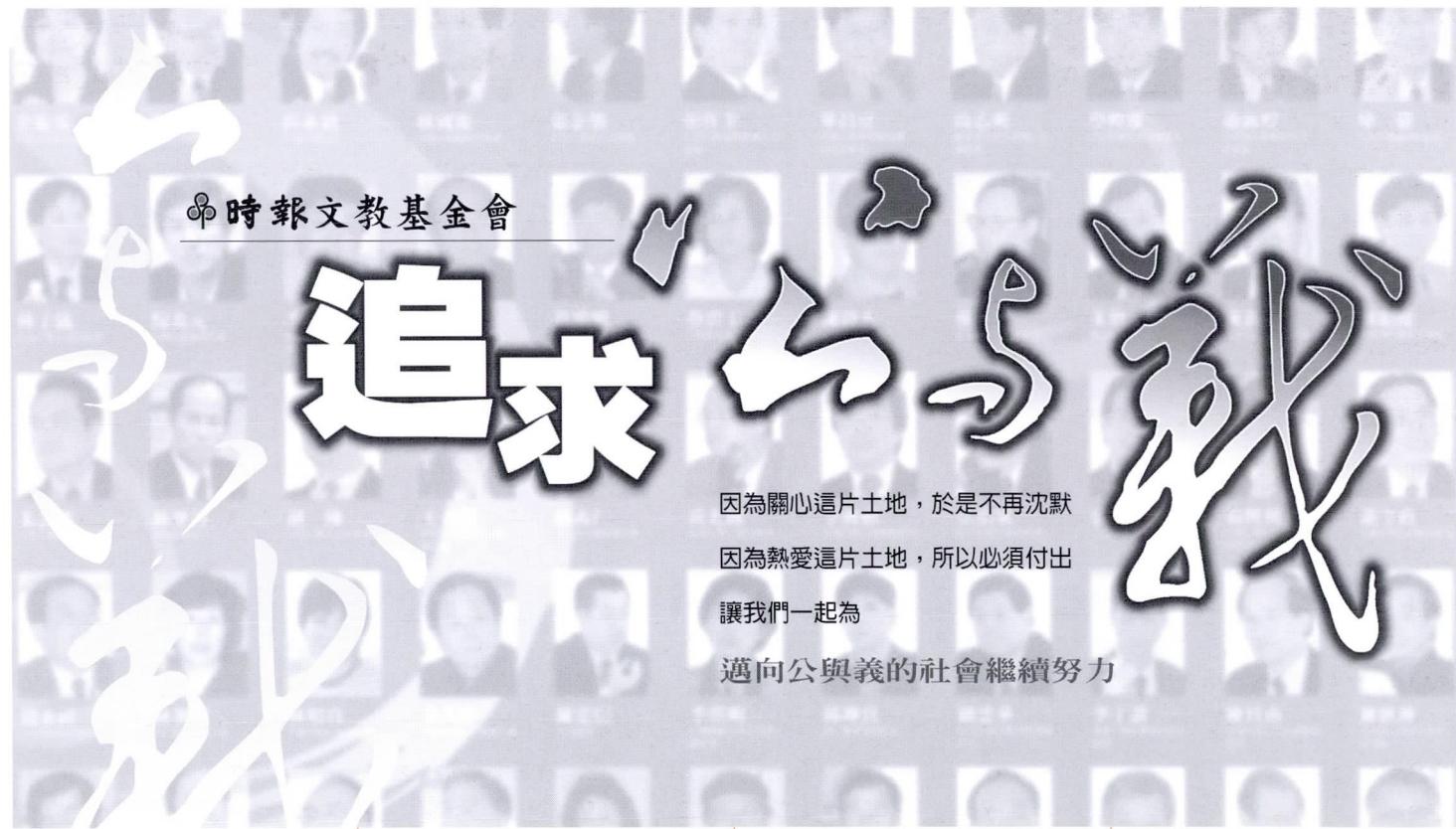
這一年多來，時報文教基金會余範英董事長與我們一群友人常有機會在一起談論事情，大家都感到社會言論兩極化，是非淆雜，不能澄清，苦思何以致此？而出路又在哪裡？

在多次談論之後，我們有幾個共同的感覺，第一：在

三年多前時報基金會舉辦「公」與「義」的討論會之後，如何實踐社會政治的「公平」與「正義」仍然是個很迫切的問題，仍然值得繼續再談。第二，我們認為因族群、政黨兩極化的緣故，壓縮了理性討論的空間，任何議題的討論皆被

「貼標籤化」，很難以理性的態度超越兩極化。尤其讓人為難的是，任何有關社會政治問題的見解，都很快地被猜測動機、被貼上標籤，迅速模糊了問題與意見的焦點，然後無疾而終。第三，我們覺得社會輿論中缺乏中間性的力量。在一九四〇年

代，當國共交鋒、難分難解之時，有一批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也深刻感到兩極化及無力感，他們稱呼自己是「第三種人」（《觀察》週刊儲安平語）。「第三種人」的處境相當尷尬，不為左右雙方兩喜，但是一個社會中應該時時保有一股中間的言論，



長遠看來，它對社會的發展是有益處的。

因此，余董事長決定，應該繼續舉行「公」與「義」的討論會，把攸關台灣社會的一些問題拿出來談。承她的美意，要我來擔任召集人，並請了朱雲漢、洪蘭、林子儀、林孝信、錢永祥等先生女士來共同規劃此事。

在籌備這次討論時，我們特別注意幾點：第一，議題的公開化以及態度的公開

化，所有的議題和討論都針對問題而發，與任何色彩都沒有關係。所邀請的人選也一樣，儘量做到兼容並包。第二，學術與實務並重。我們認為，這不是一場學術討論會，而是一個公共論壇，所以除了學有專精的教授外，我們也儘其可能邀請有實際經驗的人來參加。此外，我們也希望討論的內容除了指陳病象之外，還能提出若干的方向。第三，台灣

的新生命力是在一群年青朋友身上，應該把他們包括進來，表述年青世代的想法。

這是一群憂時的朋友們，出于善意，希望對紛擾的時局能盡一份公民應盡的責任。我們深知，要造就一個令人完全滿意的「公平」「正義」的社會是很困難的，甚至是做不到的，但是大家可以藉著一次又一次的討論向它趨近。

以下是本次「公」與「義」

討論會暫定的議題：
一、國際現實的認識。
二、政府與政黨的社會責任。
三、社會資源分配的公平正義。
四、法治與人權的公義。
五、全人教育的養成。
六、公民視野與菁英角色。
七、媒體的責任與省思。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再造公與義」研討會總召集人)

爲台灣打造新的「理性空間」

文 / 倪炎元

有許多人說台灣生病了，但要為當下的台灣做個病理診斷卻不是件容易的事。台灣當前的困境，不僅處在嘗試「找不到答案」的焦慮中，甚至還處在「找不到問題」的焦慮中。

三年前台灣初歷政黨輪替，台灣的民主轉型工程，正式邁入一個新的進程，時報文教基金會也在那個時代氣氛中，揭示了「打造公與義社會」的問題意識。這個問題意識在當時看來確實有其必要，當台灣正式告別了威權的年代，民主競爭成了政治運作的常軌，「政治鬥爭」就該逐步退場。讓全社會的注意力，校正到「公共領域」的打造上，關注到「分配正義」的實踐上。

畢竟除了政治之外，司法、教育、社區、農業、媒體、文化等領域，都存有諸多的爭議課題有待討論，時報基金會於是匯聚一群民間與學界的精英，共同為這些課題進行思索與對話，也確實希望透過這個過程，呼應當時朝野「向上提升」的動力。

惟三年匆匆過去，「公與義的社會」尚未成形，政黨輪替的新氣象，迅速在朝野循環的惡鬥中被抵消，核四、工時、中文拼音、戒急用忍、財政收支、國旗國歌、失業方案、健保收費等等，無一不掀起零和的朝野大戰，也無一不在竟日的內耗中原地空轉，泛藍泛綠的對立瀰漫於所有的政治領

域，甚至滲透到民間的相關部門，「政治鬥爭」從不曾真正退場，「公共領域」與「分配正義」也愈見扭曲與弱化，這才令人驚覺，原來問題沒有這麼簡單。

要打造一個公共領域，要踐履所謂的分配正義，前提是整個社會已存有「理性對話」的共識，偏偏當下的台灣就是喪失了這個共識。當「民主論述」在台灣獲得實現的同時，理論上台灣該當邁入「政策治理」、「福利國家」乃至「文化提升」等論述空間，但誰也沒預期竟是前現代的「認同論述」迅速替換所有上層結構的論述空間，「出賣台灣」的焦慮如影隨形，「愛台灣」與否成為檢定忠誠新尺碼，台灣社會也在不斷的分類與選邊中進行內耗，公共領域被大幅壓縮，「理性空間」蕩然無存。

伴隨理性空間喪失的，是整個國家、甚至整個社會「治理能力」的退化，統獨、族群、認同等占去了大部分的論述空間。

在重啟「再造公與義社會」問題意識的同時，我們真的該共同思索，怎麼再為台灣重建一個「理性的空間」，一個不理性的台灣，「再造公與義」是談不下去的。